

剑

桥

学

派

概

念

史

译

丛

主编 李宏图

# History of Concepts: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


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 周保巍◎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

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 周保巍◎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英)蒙克主编;周保巍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

ISBN 978-7-5617-7548-6

I. ①比… II. ①蒙…②李…③周…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1816号

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

##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

译丛主编 李宏图  
主 编 伊安·汉普歇尔-蒙克  
译 者 周保巍  
策划编辑 周 洁  
审读编辑 王惠灵  
责任校对 王 卫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6开  
印 张 24.75  
字 数 364千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548-6/G·4371  
定 价 48.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 中文版前言

李宏图

2005年,《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出版之后,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剑桥学派”的关注,这说明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为更加系统和全面地引介“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经过一段时期的研读、思考与准备后,我决定选择将“概念史”作为主题,组织同行选译与此有关的重要学术著作。因为“概念史”不仅是“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重点,而且国内学术界对此也较少关注。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帮助下,现在“剑桥学派概念史”这套译丛终于得已面世。

斯金纳在他思想史研究的三卷本论文集《政治的视界》中这样说道,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承认概念变化的事实,而且还要将它作为我们研究的中心。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概念”在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时间性和多重性日益受到思想史家们的重视,由此逐渐开辟了概念史研究,并成为具有独特理论和方法支撑的专门领域。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研究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揭示概念是如何成为社

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讨论影响和形成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义和这一含义的变化,以及新的概念如何取代旧的概念。实际上,重点是要研究在不同的时期,概念的定义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一种占据主导性定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概念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被再定义和再概念化的。同时,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概念的转换,甚至消失,最终会被新的概念所取代。

目前,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努力,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发展得较为系统和成熟,并形成了两大学术流派。一是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主要从概念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概念史。斯金纳自己也一直说,我主要关注的是概念变迁与修辞的关系。他通过对一系列概念历史的研究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在1978年出版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他研究了“国家”这一概念,着重考察作为一种全能的和非人格化的国家权力是如何进入到近代世界的。也就是说,这一定义的“国家”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代的产物。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要以“历史”的方法来“说明形成近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同样,沿着这一思路,在1997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中,他又对“自由”的概念进行了考察。在研究中,他并没有简单地重新恢复这些概念的含义和意义,而是研究这些有争议的概念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其主导性地位。值得重视的是,斯金纳不仅展开了对有关“概念”历史演变的考察,而且对支撑概念合法性基础的原因也进行了研究,探讨“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维度与语言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因为思想家们所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其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表达本身,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在用这样的修辞方式来为某种概念存在的合法性作辩护,或者解构某种合法性。

另外一种概念史研究的路径是将概念的变迁与社会的变化集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历史学家考斯莱克。由于受到德国社会史学术传统的影响,其概念史研究重点在于考察社会转型和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由于一个社会改变了其基本价值或者实践方式的时候,同时也就改变它的规范性词语。因此,要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来理解概念的变化,在长时段中把握概念的命运,即概念的兴

起和衰亡。

对于概念史的两研究路径,斯金纳评论道: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我们概念的名词有一种历史,这些名词的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它们最终也会消失。我承认,概念的“命运”这类长时段的变迁并不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这里,我的方法与考斯莱克和他的同事们完全不同的,他们主要关注于缓慢的时间进程,而我则更多地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

从概念史研究的空间来说,目前不再仅仅局限在这两大流派的诞生地英国和德国,法国、荷兰、芬兰、美国、土耳其等国家对概念史的研究也十分踊跃,这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们还组织了国际概念史研究会,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组织课题研究,开办概念史讲习班,甚至进行跨国度的联合研究。即使在亚洲地区,韩国和日本的学者也已进入到了概念史研究领域,2008年在首尔还召开了国际概念史学术讨论会。

目前,国内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进行过系统地介绍。与开展概念史研究的其他国家,即使与我们相邻的日本和韩国相比较,我们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正鉴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翻译这一套丛书,借以推进国内概念史研究的发展。

在这套丛书翻译出版的过程中,作为这套丛书的主持者,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译者,他们都是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佼佼者,为了做好此次翻译工作,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推掉了其他的写作任务,一心扑在了翻译工作上。其次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诸多朋友,特别是责任编辑周洁女士,通过他们的努力,从版权的洽谈到图书的编辑,各个环节都做到了高效和顺利,从而保证了这套丛书的如期出版。

在这套“概念史”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学界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例如北京大学历史系黄洋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寿福教授、张巍博士和夏洞奇博士等,他们帮助处理了诸多语言上的问题,在此表示谢意。

2008年,当这套丛书还在翻译中的时候,恰逢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我也应一家杂志之约对国内30年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作了回顾。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这样写道: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思想史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在这一

变化中各个国家都已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中国学者才刚刚开始接受和引进他们在这一变化中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仍然还没有参与到国际学术界这一变化的学术发展进程中,更不要说已经形成了我们自己独特且有原创性的研究取向和理论方法,或者说研究范式。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自暴自弃,相反,我们的未来任重道远,更需要加倍努力,迎头赶上。

也许本套译丛能够体现我们的这一主旨,并印证着我们一直耕耘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的那种执著和努力。

2009年11月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y L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Frank van Vree

Copyright © l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Frank van Vree /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 - 2008 - 648 号



## 致 谢

要不是“荷兰高级研究院”(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简称 NIAS) 的慷慨赞助, 本书也许将永远无法面世, 因为正是在该研究院的大力襄助下, 一个国际性的“概念史研究小组”于 1994—1995 年得以成立, 而正是这个“概念史研究小组”启动了当前的这项研究。起初, “概念史研究小组”只是个研讨小组, 对其所感兴趣的“比较概念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 后来它又成为本书的编辑委员会, 用以指导本书的编写工作。对于汉斯·鲍德克(Hans Bödeker)、皮姆·登·博尔(Pim den Boer)、马丁·万·吉尔德伦(Martin van Gelderen)和魏格·维勒玛(Wyger Velema)所提交的高质量的、极富原创性的论文, 以及他们所提供的编辑上的支持, 我们在此谨致谢忱。同时, 也正是由于“赫伊津阿研究院”(Huizinga Institute)所提供的慷慨经济资助, 我们的编辑会议才得以定期召开, 同时, 也正是在它的资助下, 由皮姆·登·博尔所写的那篇论文才得以请专人译成英文。对于“赫伊津阿研究院”院务委员会的帮助, 我们愿表达最衷心的感谢。我们同样衷心感谢来自于海德克·穆勒(Hendrik Muller)博士的 Vaderlandsch Fonds 和 the M. A.

O. C. Gravin van Bylandtschting 的支持,正是在这些机构的慷慨帮助下,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尼克·万·萨斯(Niek van Sas),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出版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同时,还要感谢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的诸位同仁,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尤其是在本书最后成书阶段对本项工作所给予的信任和坚持不懈的、热情洋溢的鼓励。没有他们的努力,本书也许根本就无法与大家见面,当然更不会有当前的这种高品质。

伊安·汉普歇尔-蒙克(Zain Hampsher-Monk)

卡林·提尔曼斯(Karin Tilmans)

弗兰克·万·维里(Frank van Vree)

阿姆斯特丹/埃克塞特 1998 年春

# 引 论

##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

近几十年来,对于“语言”在理解“现实”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长的认可,已经急剧地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这种改变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政治语言史”(history of political languages)和“政治话语史”(hist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的发展。然而,在这种变化的内部,各个国家在研究取向及方法论路径上却迥乎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各国有着截然不同的语言学传统和学术研究传统。而本书就旨在展示“概念史”当前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并在此过程中力图揭示那些寻求以不同的方式应用“概念史”的诸学术传统。

在德国,人们对于“概念史”的兴趣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黑格尔,并在瑞因哈特·考斯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奥托·布鲁勒(Otto Brunner)和沃尔勒·孔茨(Werner Conze)所领衔的一项雄心勃勃、名

---

\* 注解:*Begriffsgeschichte* 这个词在德语中的意涵较为宽泛,而在本书中,除非有特别的注明,*Begriffsgeschichte* 一般意指与“历史中的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这项学术工程及其遗绪(successors)相联系的著述和研究路径。

垂青史的学术工程中臻至顶峰。该项学术工程旨在研究历史中的基本概念——也即《历史中的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sup>\*</sup>,特别是研究这些基本概念“既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推进器(factor),又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指示器(indicator)”的功能。这项学术工程的最终成果是两大书系:其中的一个书系名为《历史中的基本概念:德国的政治-社会语言词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e-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该书系于1972—1992年间共出版了七卷,专门探讨和研究德国的社会-政治语言;另一个书系名为《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从1985年以来,该书系也已出版了十五卷,由罗夫·瑞夏特(Rolf Reichardt)和艾伯哈德·施密特(Eberhard Schmitt)主编。

这两大书系都聚焦于“概念”,因为在丛书的编者和作者们看来,就法律、政治、科学、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意识形态而言,“概念”对于“现代世界的语言构造”(sprachliche Erfassung der Modernen Welt)是至关重要的,正是通过“概念”,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各种政治派别才得以表达他们的经验、预期和行动。<sup>①</sup>一个绝佳的例子便是“Herrschaft”(意为控制、支配、统治、命令)这个概念,这个《历史中的基本概念》中的开篇词条已在梅尔文·里奇特(Melvin Richter)的近著《政治和社会概念史》(*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中得到了详尽的探讨。<sup>②</sup>这些概念都是在一个较大的时间范畴内被加以探讨的,有的甚至被溯源至古代。然而,其重点探讨的却是启蒙运动之后的这段历史时期,在他们看来,该历史时期构成了一个“分水岭”或“鞍型期”(Sattelzeit)——Sattel,从字面上讲,也就是一个“鞍状物”(saddle),在这里,它所激起的是这样一种意象——一个连接两个山谷的峰岭的意象。由“Sattelzeit”(鞍型期)这个词所指称的转型是趋向于“现代性”的历史转型。对于考斯莱克——他被视为是德国“概念史”项目的开拓者——而言,“现代性”是以影

---

① R. Koselleck, 'Introduction' (“引论”),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Vol. I. Cf.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Vol. VII. Stuttgart 1992.

② Melvin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Oxford 1995.

响社会及其自我意识的四个过程为特征的：时间化 (*Verzeitlichung*)，民主化 (*Demokratisierung*)，意识形态化 (*Ideologiesierbarkeit*) 和政治化 (*Politisierung*)。

“概念史” (*Begriffsgeschichte*) 方法论的核心是援引自“语言学”的几个技术性、分析性概念。作为“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人，瑞士学者费迪南德·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早已注意到了语言的“共时性”层面和“历时性”层面：语言会随着时间的演化而演化，但是它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一个既定的结构。“概念史”既聚焦于语言的“历时性”层面，也聚焦于语言的“共时性”层面，它不仅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点上，在一个特定的语义域内对“核心概念” (*core concepts*) 做“共时性”分析，而且还对“核心概念”做一种“历时性”分析，这种“历时性”分析将凸显出“概念”的意义变迁。

“概念史”项目的奠基人试图克服“历史语文学” (*historical philology*) 和“词典编纂学” (*lexicography*) 的局限。这就要求他们并不把“概念” (*concept*) 简单地等同于任何单个的“词语” (*word*)。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有三个分析性的语言工具非常重要。第一个分析性语言工具是“语义域” (*semantic field*) 这种观念，“语义域”观念开辟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即人们不再以词典性术语来定义一个概念，而是以一系列典型的“同义词”、“反义词”和“关联词”来定义一个概念，并由此形成一个统一的词汇群。所以“*Herrschaft*”这个概念应该在同一“语义域”——诸如在“*Macht*” (权力)、*Gewalt*” (力量、暴力)、*Autorität*” (权威)、*Staat*” (国家) 或其他相关的概念中——中加以研究。同时，“概念” (*concepts*) 和“术语” (*terms*) 之间的区别也由“名称学” (*onomasiology*) ——研究可以用来指称相同或相近的事物或概念的不同术语——和“语义学” (*semasiology*) ——研究一个给定术语所具有的全部的、不同的意义——之间的区别而凸现。因此对于“自由”概念的名称学分析就是要寻找可以用来指称“自由”概念的所有词语和表述，与之相反，对于“自由”这个词的语义学分析就是要找出“自由”这个词所承载或具有的各种意涵。

“概念史”项目是一项规模浩大、具有独特方法论的学术工程。然而，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和英语世界，学者们都远离了“思想史”和“政治观念史”研究的早期

路径。例如约翰·波考克(J. G. A. Pocock)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都对“语言”的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重新界定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去辨明并重构“政治行动”得以在其中完成的“语言”。其他学者也都采取了相似的立场,也即远离政治思想的“经典名著”,而转向“概念变迁史”、“政治话语史”和“政治语言史”。

奇怪的是,历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它与“语言学”和其他专业学科的学术传统紧密相连——既是同时发生的,又是相对独立地发生的。本书不仅力图对“概念史”的新近发展给出解释,而且还力图对其结果进行批判性反思,特别是要对“概念史”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基本前提进行比较。

本书源于荷兰历史学家的一项动议,本书以及它所代表和引领的学术项目,可以说是致力于在“概念史”各种研究传统的冲突中去发现其“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尽管多卷本的《历史中的基本概念》(*Geschiedelijke Grundbegriffe*)的成就让人瞩目,给大家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考虑到荷兰“概念史”项目的可能性,荷兰学者感到他们必须发展出一种适用于低地国家历史独特性的方法路径。<sup>①</sup>正如《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的编辑们所感受到的那样,德语世界“概念史”的一些主要特征——例如其对于18世纪作为“鞍型期”、作为“概念现代化”(conceptual modernisation)的时代的片面强调——看上去与其他语言世界“概念史”的关联甚少。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历史中的基本概念》没能探讨和研究“图像”(images),或者更具体地讲,《历史中的基本概念》没能探讨“文字表述”(verbal representation)与“图像表述”(visual representation)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对于“视觉语言”(visual language)的深度分析,就不可能写出确当的“社会-政治思想史”。

既然有些荷兰学者对英语世界中“概念史”的发展也颇为熟稔,他们就很容易见

---

<sup>①</sup> Wyger Velema, 'Over de noodzakelijkheid van een Nederlandse Begripsgeschiedenis', 载于 *Bulletin. Geschiedenis, Kunst, Cultuur*, II/1 (1993) 27-40; Pim den Boer, 'Naar een geschiedenis van begrippen in het Nederlands' 载于: S. Dik and G. Muller (eds.), *Het hemd is nader dan de rok. Zes voordrachten over het eigene van de Nederlandse cultuur*, Assen/Maastricht 1992, 47-60。

证到“概念史”不同传统之间的冲突。荷兰学者认为,对于“概念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的探讨,将有助于为荷兰的“概念史”建立一种坚实而可行的基础。自1990年以来,最初在阿姆斯特丹,后来在“荷兰高级研究院”(NIAS)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和研讨会。与会者不仅有荷兰的学者,而且也有来自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采用不同的“概念史”研究路径的同行。本书的一些文章是从在“荷兰高级研究院”所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和讲演中精选出来的,还有一些文章是专门为这次结集出版而撰写的。

作为沟通、解释和重新思考“社会-政治思想史”不同研究路径的一种努力,本书带着这样一种愿景——即将其探究的成果纳入荷兰的“概念史”研究项目。故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范例,本书将着力凸显荷兰“概念史”研究的独特个性。自中世纪以降,低地国家(指荷兰)基本上扮演着一个国际性市场的角色,它不仅是货币和商品交换的市场,而且是观念和文化产品交换的市场。起初,这个市场既因“荷兰共和国”宰制性的商业和政治地位而获益,也由于其不存在一个独裁性、集权性的政权,以及其盛行的经济和宗教自由而获益。后来,荷兰充分利用了其作为西欧各新兴大国所环绕这个有利的中心地理位置。荷兰“概念史”项目的最初研究成果表明,在“概念”和“话语”的发展方面,荷兰在欧洲思想史中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即便是今天,决策专家、学者、艺术家和民族认同理论家也认为,这种“掇客”角色仍居于荷兰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核心。因此,从一开始,对“荷兰概念史项目”的倡议人而言,就“概念史”的各种研究路径进行跨民族的比较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而然的”。

本书由十三篇文章组成,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并讨论了“概念史”所涉及到的方法论问题,以及英语和法语学术圈内相关的思想追求。

在开篇的第一章中,皮姆·登·博尔(Pim den Boer)以细致的笔触描述了《历史中的基本概念》这项宏大学术工程的制度性起源、雄心和作为,它在德国历史学研究传统中的地位,以及编辑们的个人贡献,同时也描述了作为《历史中的基本概念》之

余绪的《法国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然后博尔又介绍了荷兰的“概念史”，并探讨了我们可以从同类的“概念史”项目中期许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就现代早期荷兰社会的特殊情况而言，它可以告诉我们些什么？对于现代早期的荷兰社会而言，我们可以期许怎样的一种截然不同的“鞍型期”？在这样一种研究中，荷兰的“概念史”可以反映出怎样的一种比较视野？并且，作为语言上的一个“开放性”空间，荷兰对于各种自然语言之间的“概念移植”（conceptual transfer）和“概念征用”（conceptual appropriation）这一特定问题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种洞见？在本书中，佛瑞豪夫（Frijhoff）和鲁斯布伦克（Lüsebrink）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作为“概念史”的奠基人和最重要的实践者，瑞因哈特·考斯莱克所撰写的文章探讨了散见于本书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考斯莱克强调，“概念史”的诉求不仅仅是历史领域内另一种样式的“术业有专攻”。尽管人们可以以建立“服饰史”、“海战史”的方式来确立“概念史”，但考斯莱克认为，“社会 and 语言是元历史（metahistorical givens）的一部分，没有语言和社会，历史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历史研究领域内的所有专家都必须涉猎“社会史”和“概念史”，并且正是“社会史”和“概念史”之间的创造性紧张，才是考斯莱克所希望我们要加以注意的。因为“实际所发生的事物显然远比产生或诠释这些事物的语言阐释丰富”。

考斯莱克声称，承认语言的过滤性——正是通过这种语言过滤，我们（和历史行为主体）才得以阐述我们的经验，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化约为“语言史”。但是它也不意味着：在对我们所考察的历史行为主体所用的“概念范畴”完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长时段的人口统计数据仍然可以为我们所用。此外，“社会史”和“概念史”都展示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维度。这就意味着，每个主题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点上都包含着一个稳定的结构，这种稳定的结构赋予个体场景或行动以意义，同时它也随着时间的演进而演化。结构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语言”（*langue*），在其中，行为主体可以施行他或她的“言语”（*parole*）。我们可以发现，在时间的绵延中，像“婚姻”这样一个抽象概念具有一种稳固的和有意义的所指，正如我们可以发现“婚姻”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具有专门的涵指。同样，我们可以把每种婚姻仪式看作



是一种“言语”，一种“言语行动”(speech act)，它体现了婚姻的“语言”(language)，并由“婚姻”的语言使之成为可能。这种历史知识使我们变得更为敏感，我们可以构建一个长时段的“婚姻发生指数”——是以“婚姻”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布为其“共时性”维度，以“婚约”的兴衰为其“历时性”维度。因而，可以说，“社会史”和“概念史”是相互关联的，不仅在于它们的研究成果是相互补充的意义上，而且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也即：如果没有彼此所提供的洞见，“社会史”的实践和“概念史”的实践都难以成功。

伊安·汉普歇尔-蒙克(Iain Hampsher-Monk)勾勒出在语言应用方面践行“政治观念史”的三种模式：约翰·波考克所追求的基于独特的“政治语言”(political languages)观念的模式，昆廷·斯金纳所追求的、聚焦于奥斯汀(Austin)和塞尔(Searle)的“言语行动”分析的模式，以及“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模式。蒙克试图强调每种模式的独特品性，但最终却发现前两种模式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蒙克的比较分析强调了英语世界的“概念史”和德语世界的“概念史”之间最初的“焦点”截然不同，在英语世界，人们所关心的是那些还不是“词语”(words)的“概念”(concepts)，蒙克还强调了英语世界的“概念史”模式与德语世界的“概念史”模式之间显而易见的水火不容——在英语世界里，人们强调需要有一种广阔的“共时性”语境，以便能辨明特定的“概念”；而在德语世界，为了“历时性”分析的需要，人们则试图把个体概念从其“共时性”语境中剥离出来。作为最后的评论，蒙克强调，在英语世界的“概念史”中，人们强调人的能动性，相反，在德语世界的“概念史”中，人们则更强调历史过程。

在对“概念史”的批判性评论中，汉斯·鲍德克(Hans Bödeker)挑选出与德语世界独特的“概念史”模式相关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第一，辨明并挑选各种相关的“基本概念”来加以研究。第二，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教诲的那样，所谓的“意义”就是“用法中的意义”(meaning in use)，它涉及到这样一个认识论问题：也即特定的使用者和用法在经验上是不稳定。这一认识论问题由18世纪后期阅读以及阅读公众的多样性问题的爆发而浮现。第三个问题——已经为